

熊泾阳谈话散记

张 维 仲

时值清明前后，沙洋黄土坡农场离休干部、江南游击队创始人之一熊泾阳同志，故土重游，回到了家乡五峰长乐坪镇洞口村，为在黎明前为革命而献身的父亲和战友们扫墓祭灵，旧梦新温……

我有幸见到这位当年曾经出生入死、叱咤风云的革命长者，是在县政协副主席周绍全同志家中。那天是个晴朗的日子，周主席、县人大办公室的宋德春主任和我，在客厅里与熊泾阳同志畅谈了整整一天。他虽然已年逾七十，但仍精神矍铄。一杯新茶，他的兴致便渐深渐浓，话匣子打开，如一条悠长的河流动着，时缓时急，时低时高。我们的思绪便沉浸在那条河里。

熊泾阳同志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叙述：

我于1917年旧历3月初1生于五峰县长乐坪杨柳池，父亲熊生陔，母亲姚氏。全家五口人，我上有一个姐姐叫熊传珍，下有一个妹妹叫熊传静。因我家处于渔洋关至县城必经之地，常有过往客人投宿。我父亲年轻时会耕田、会干各种农活，论成份只能算作富农，作为绅士家庭是后来划定的。不过，我的家庭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，又完全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作为绅士家庭，也是当时的革命对象。南兵（北伐军的一支）打渔洋关时，渔洋关商团跑了，我们家也

躲了起来。听大人说，我满周岁那天，荆州史关克威从长乐坪经过，烧了几十栋房子，说明很不安定。我就是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长大的。

小时候的事，我还记得很多。但印象最深的是1927年，那年，我刚好10岁。邓宗禹到了五峰。记得当时的县长叫彭吾林，是湖南人，据说是唐生智派来的。不久，就听说来了“赤化党”，“赤化党”一来就组织发动了学生，提出“打倒土豪劣绅、铲除贪官污吏”等进步口号，并给土豪劣绅们穿红背褂子、带绿帽子游街，我们这样的家庭当时也是很害怕的。后来学生们又去抓杜笑庄。结果没抓住。杜是团总，曾当过军阀旅长。后来杜笑庄带商团回五峰，把邓宗禹等人抓了起来，开全县的绅士会议。我父亲大概在当时也名声很响，所以也通知去参加了这次会议。会上，杜笑庄脾气很大，公开说要杀人，但本地人只要有人保可以不杀。邓宗禹是外来人，公开身份是指导员，没有人敢保他，后游街至南门，据说被杜西伯所杀。邓宗禹被害后的一天，有个留分头、穿制服的青年逃到我家，那人是谁我不知道。只见我父亲请人给他理了发，换了便衣。分手时又亲自送给他两吊钱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人是邓宗禹的人，是共产党的工作者，我父亲掩护他脱离了险境。说明我父亲思想很开明，对当时的革命者从内心是同情、支持的。

杀了邓不久，国民党四十三军开进五峰，是蒋从贵州调来的。我父亲即要为其筹办粮草等一类物资，处境艰难。他们中有个姓雷的师长和姓龙的旅长，都会打仗，在长乐坪一带招兵买马，宋益盛等都去当了兵，宋后来当了中统特务。四十三军来时，彭县长跑了。派吴培宪在五峰做官，局势仍觉得很乱。在这期间，我家还办有一个私塾，启蒙先生叫田松

清。我从3、4岁开始读私塾，内容主要是四书、五经，全靠死记硬背，意思不大懂。一直到12岁仍读私塾，并开始学做一点文章，称之为“论说”。贺龙初进五峰，先打孙俊峰团防，接着火烧了县衙门。我们家就跑了，我也就再未读私塾。

一直到1934年，贺龙走了，川军又进了五峰。这一年，长乐坪开始正式办起了长乐坪小学，当时我已经14岁多了。为首办学的有我父亲、张宝善、汤式如，并聘请了周美阶当校长。周博学多才，曾在宜昌“益世小学”教书，在当时教育界很有名望。因而聘请了他当校长，工资是40元光洋，与在宜昌的待遇一样。以前在家中我不过做些小事，这一次却交给我办一件大事，叫我到宜昌买教具，是我第一次单独出远门。以前只到过宜都，且跟着大人一道。这一次我单独出远门办事，既高兴又紧张，但还算顺利，我带着200元光洋，未出一点差错，购回了全部要买的东西。大人们为此都称赞我挺能干。开学后，我是第一届学生，同班的也大多数是乡官子弟，且年龄较大。

1935年，我结束了小学生活。离开家庭，到宜昌一所四川同乡会办的私立旅宜中学读初中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这所学校很进步，官府又不管这类的学校。当时学校的校长叫杜孚生，他后来到了延安。语文教员是曾留学日本的张泽生，体育教员田仲良，都很进步。在此期间，我第一次呼吸到了一些新鲜空气，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，思想开始转变。“一二·九”爱国学生运动暴发后，我们也参加了。我是级长，我们共有500多人上街游行，高呼口号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、“保卫祖国”，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。同年又参加了学校“读书会”，读到了许多进步刊物，接受了许多新知识、新思想。

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，蒋介石被扣留，我们又参加了游行声援，一致表示拥护中共提出的八条抗日的政治主张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我是学生会干部，一起组织学生抬担架。我在普济医院学了两个星期的战地护理工作，投身抗日救亡的热潮。1937年底学校被炸，迁到古老背，产生了党的外围组织，叫“抗日民族青年救国团”，刘其负责发起，实际上是地下党领导的。这时，学校形成两大派，另一派叫“青年行动委员会”，是国民党湖北第六区党务指导专员直接插手领导的，相当反动。我们救国团共有20名骨干，与“青委会”的斗争很激烈，也很复杂。

1938年日军逼近，我们也暑期毕业。国民党办了“湖北省联合中学”，搬迁恩施。我被分配到建始师范读书。1939年，我在建始师范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记得介绍人有张多立，是当阳人，还有建始地下党县委书记沈德枢，是高我两班的同学。入党那天正好是“五一”，地点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山洞里，我们秘密的宣誓，说不出内心的激动。宣誓后的第二天，我又与沈德枢碰头密谈，开始从事地下工作。当时我的名字还叫熊鲤川，不叫熊涇阳。学校很复杂，有三派政治力量，而共产党的力量相对薄弱，教员中也只有一名军事教官是进步的，对进步学生采取同情、保护态度，学校极不安宁。40年我们学校死了一名学生，由此和校方发生冲突，出于义愤我们组织了一批学生抬尸至校长床上示威。校长跑到恩施找陈诚告状，陈派人到校整顿，我于是在这次学潮中被开除了，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。

被学校开除后，我处境很难。这时，党组织为此专门开了一次支部会，上面也派来了人，分析了这次斗争的教训，并具体研究怎么办。最后决定由我自找职业或是回家。我不

愿回家，便决定自找职业。于是，我改名熊涇阳，在1940年8、9月份到恩施农业改进所谋职。该单位进步人士较多，我通过关系开了一个假证明，投考农业助理推广员。参考后，我被录取，并被分到宣恩农业推广处，于10初在宣恩高罗区种麦子办点。同时与该地基层党组织取得了联系，联系人是董其藩，又名童刚。他说：“我主要是与你取得联系，先不要盲目开展活动，以保存实力。”接着又问我知不知道五峰的几个女同志。我说：“知道”。这样我就回了一趟五峰，把消息传给了五峰的两名女同志。童刚跟着也就到了五峰我家中，他是来调那两个人走的。后来周美阶告诉我：“你家来的那个客，引起了邵化南的注意。”并说：“他与那几个女老师见了面，是在晚上。”从此以后，我与童刚失去了联系。1941年3月，我在宣恩连续收到家中两封电报，催我回家，说“祖父病危”。因为当时大抓人，家中担心。接电后，我从宣恩经鹤峰回家。家父说：“祖父未病，怕你在外面瞎搞，要你回来呆几天。”我于是去找田子模商量。当时我已被通缉，消息可能田知道。田子模说：“我俩不能闹意见，因为我们走一条路”，这样我明白了田的身份。大约7、8月间，我和田子模到宣恩县弄小麦种子。农推处李主任说：“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了”（指被通缉一事）。年底我又到咸丰会一个同学，并商议考大学。这时家中又转来一封电报，说我“祖父死了。”同学给了我20元钱，我就回家了。父亲要我学做生意，我就回了五峰。又找田子模商量，田就把我介绍给了刘福海（地下党组织支部书记），我从此和刘认识了，并一起在校教书。田子模当时公开身份是县参议员。我教了不到三个月的书，就到了1942年3月，朱怀冰（民政厅长到了五峰，并来找我。在此之前，长乐坪小学已经出事，

地下党员李乐山、万雪波夫妇身份暴露，县府派人来抓他们。我一出门，就见学校外有哨兵，到了学校，发现正在搜查。我问：“你们抓人有无证据？”他们拿出了李、万二人的照片。我说：“我保下来行不行？”朱元涛答复说：“要保你保万先生。”他们就把万雪波留下来了。我急忙找田、刘商量，最后没保住。因未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，地下党组织没有力量，无法营救，半月后万又被抓走了。朱来找我，我已有预兆，因为朱在松滋、宜都抓了人。我即向田子模请假，田同意我暂时避一避。朱怀冰他们晚上集中教员点名，点到熊泾阳时，便暴露了。他们就逼我父亲交人，我父亲表示不知道。我晚上才回家，田子模和我商量怎么办，最后决定由我去自首（三人中已捕了二人）。并征求章致全（地下党员，公开身份是县长）的意见。章说：“你去见朱怀冰，他们没有证据，是杀不了你的。”我就到了县城找朱怀冰，开始还论了理。朱问：“你叫熊泾阳，还是叫熊鲤川？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？”我说“共产党抗日。”朱骂道：“共是匪。”并叫人把我押起来，交给了中统头子李振鸥。我要张宝善、骆存之保，他们要我父亲保，一个星期后，被家父保了出来。这时，恩施农推处委我当推广站副主任，但不久朱怀冰的批文下来，要将我押送恩施，并关押在青鱼塘案犯管理所。在管理所我又结识了几位进步人士，生活是一天两顿饭，每天的事情是喂猪、搬柴火。我被关了三个月，才通知我找保人，说可以释放我。我于是找了保人，填了保证书，就被放了。因为我身下一直没有什么。回来后，我就将全部经过情况如实地向田子模、刘福海作了汇报。

1943年，日军入侵渔洋关，我父亲迁家湖南。日军退后，刘春先在五峰当县长。后来，刘要我当忠孝乡乡长。我说：

“我当不了乡长”。刘春先就要张宝善、骆存之转告我，说刘手中还有朱怀冰的一纸手喻。这样我只得当了乡长，并得罪了许多绅士。一次，县长打电话把我找去，对我说：“熊泾阳，你的事你自己知道，你讲一讲你的事。”要我交待暴动的事，随即把我关了禁闭。又要我父亲来保，父亲未来。我就仍被软禁在县城，住李振鸥家，直到1943年底才放回去。住到1944年清明过后，李忽然带了一个消息，要我速离湖北，说去年报的案子，陈诚批了字“杀”，我就托关系弄到了一张去重庆考大学的假护照，和几个朋友经宜昌三斗坪上船到了重庆，躲过了这次杀身之祸。到重庆的事家中无人知道，我们是悄悄起程的。

不料到了重庆，处境更难。我们一时衣食住宿均无着落。我的一位朋友去求他的姑父，仅给了一元钱就不再理睬了。后来幸亏朱元涛在一家黄酒厂找到一位熟人，住了一段时间。才由朱的姑妈帮忙，与贵州一家茶叶公司联系，找到了工作，并给我们汇来3000元路费。我就随流落到了云南，接着进了顺宁茶厂，朱当技师，我们都是技术员。

1945年5月，我收到田子模的信，信中说“家中来了人”，要我马上回去。我知道是上级来了人，赶紧筹措路费，起程回家。到了昆明，日本就投降了。我们一路步行，到泸州后才坐船，抵达宜昌已是1945年底。我先给家中写了封信探听消息，不久家中回信说：“通缉未撤销，刘还是县长，不能回。”我于是决心到北边找新四军，到了襄樊，住了一个星期，见关卡太严又回到宜昌，并于春节潜回五峰。到长乐坪田子模家团年，交谈了彼此情况，并约定初七见面。在流亡了一年半之后，于1946年2月，即正月初七和松、宜、滋中心县委书记刘家瑞正式见面，接上了组织关系。此时，我

的通缉虽未撤销，但由于刘春先和王凤武（议长）内哄，我为此住了几个月。后来，根据组织决定“争取打入敌人内部”的方案，我竞选当了信益乡的乡长，田子模当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。

1947年2月间，李仁林的部队过江。田中夷带信给我说：“是我们自己人”，我即要毛云峰去与李仁林取得了联系。4月，李仁林在红渔坪成立了江南游击纵队。中心县委也在宜都开会作出决定，确定举行一次武装暴动，搞掉信义乡公所枪支，建立一支七、八十人的武装队伍。我于是把枪支全部集中到乡公所，暴动队伍经清水湾到大松树，直捣乡公所，夺取了全部枪支。但这次暴动的结果不好，夺取的枪支全部被湖南向运东截走了。8、9月份，组织研究决定我、田子模、刘家瑞都出来，举行一次暴动，建立一个支队，我任副支队长。行动那天，因计划执行欠周密而未达到目的。到47年底，张光远在湖南被害，刘家瑞、毛云峰也暴露了身份，五峰只我和田子模了。

1948年初，我从沙市买教具回家的第二天，田子模的父亲送信说：“出了大事，田先生（即刘家瑞）被捕了。”我和几个民主建国团的成员紧急商量，并电话通知田子模回来。我说：“现在只有一条路，上山，上湖南，非走不可。”当时就定了五天后行动，田子模回县城迅速处理一切遗留。第二天，我接到县城电话，通知我准备招待一个中队，在渔洋关开联防会议。我意识到问题严重，立即吩咐田子模速离县城，不能久呆。我即带郭济南等三人上了壶坪山。上山第二天，田子模被捕，我回家探消息，王海清告诉我：“你家被包围了，正在抓你。”我说：“我要上山了，打游击。”王海清、郭济南愿跟我一起干。宋德富在半路上跟我走了。晚

上几个人睡一床被子，十分清苦。后来，队伍逐步扩大，连同田中夷带来的 8 人，有了几十个人，几十条枪，壶坪山地区的武装斗争从此开始了……

暮色苍茫。熊泾阳同志的谈话仍在继续。

（待 续）

马胜祥回忆散记

覃远照 戴琳

带着对先辈革命斗争精神的仰慕之心，我们冒着烈日来到了地处高山的万子河，找到了七十九岁的马祥胜老人。当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，马老便在沉思之中打开了话匣子。

记得那是庚午年（1930年）的早春二月，我们“同心会”（又称“薄刀会”）的领头人黄自俊派我和黄自茂一起到鹤峰金鸡口乌鸦关去接头，我们在贺龙将军的部下陈连振找到了杨书香营长和向宝山连长，说明来意后，他们接收我们“同心会”战员参加红军。我们非常高兴，连夜赶回采花地龙坪。接着，黄自俊带领我们九十多人参加了红军。我们被分到各连队，黄自俊当了第二补充营参谋长，自美当了二连连长，我也当了排长。事后不几天，杨营长就率领我们三百多人到地龙坪黑包上扎营，开始了与当地土豪劣绅的较量。

一次，我们把匪头目胡元卿的张大队副围到了阳寨沟五马洞里。因为他手里带了支步枪，洞子又很大，里面阴森森的，不便于冲击，我们便用辣椒熏，逼他出洞缴械，这家伙很狡猾，硬是不出来。湖南籍战士覃遵云自告奋勇，甘冒生命危险冲了进去，在受伤的情况下靠着机智和勇敢活捉住张大队副。战士们气愤至极，给匪徒处了极刑，为民除了一害。

为报这一箭之仇，匪首胡元卿纠集了几百人在其中队长周坤堂的指挥下，围攻我地龙坪营部。我们为保存实力将营

部迁往鹤峰三洋河，在黄潭与匪徒杨玉山、张老五打了一仗，为避免大的伤亡，我部撤到金果坪。不久团部命令我们到榨金坪集结，正巧碰上了当地团联匪首黄元齐，双方开火。黄匪在我部猛烈的攻势下狼狈逃窜。我们一路追杀赶到关连口，彻底消灭了这支土匪。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采用灵活作战的战术，消灭了不少敌人。我们的队伍也不断壮大起来了。

敌人也是很狡猾的。吃了亏总要寻机报复。有一次红军中央独立师师长黄超群率部西进寻找红军主力，途经采花磨家溪。看到鬼岩屋这个地方山势高峻，峡谷幽深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，怕遭伏击。便差人与胡元卿交涉借路”。胡十分阴险，一面满口答应，一面推说要跟区长覃石林商量，暗地里设下埋伏。当黄部走到鬼岩屋地界时，突然两山炮火轰鸣，胡匪只花了少许枪弹，用鞭炮虚张声势，借助有利地形打散了红军队伍，这次战斗红军战士牺牲59人。土豪劣绅胡元卿真是罪大恶极！贺龙得知后气极了，命令我部给黄师长报仇。有一天我们得到消息说胡元卿在长茂司胡家台胡德朋那里吃酒，我们从红渔坪前去突袭，不想狡猾的胡匪听到动静逃跑了。我们一气之下烧了他在胡家台的屋，缴获了一些财产。

说起来，那时处处打游击，是非常艰苦的，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。

辛未年我们部队开到巴东，听说匪徒谭登国在当地称王称霸，横行无忌，无恶不作。我们打算除掉这一害。可他的碉堡非常坚固，匪徒们也都是些亡命之徒，很难对付。我们便组织了50人的敢死队，先后抓获了敌人8个探子，7个顽固分子被枪决，有一个答应为我们带路攻打碉堡。我们计划夜里叫开城堡门攻进去。谁知那家伙十分狡猾，明为引路，

暗施诡计。正当堡卒准备打开大门时他突然大喊：“红军来了。”一句话未完，里面锣鼓猛响，炮火升腾。一颗罪恶的炮弹落在碉堡门外，顿时火光冲天，我们的十几位战士倒在血泊之中。接着，匪徒从四面围来，情况万分危急。我急红了眼，顾不得是死是活，喊一声：“不要怕，跟我来。”正巧这时双方接近，敌人不好放枪，在乱阵中我一阵马刀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冲出了包围，向东南方向的一个冲里飞奔。这时黄自美连长拿着一支“过三辽”火枪，他在还击敌人时由于灌药太猛，枪管爆炸，右手炸掉了。我们将他扶上骡子。没跑多远他由于体力不支被摔下来了，眼看敌人追上来了，我们要背他走，他死活不干。强令我们快走，他作掩护。我们含着泪水服从了命令。他却不幸落入敌手，受尽了酷刑。敌人在他背上绑上火炉子，前面用人拖他的手，后面用人加炭煽火，身上烧得青烟直冒，一次又一次昏迷，可他没喊叫一声，也没向敌人吐半个字。就这样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一个多么刚强的汉子啊！

自俊也死得很惨。1931年的7月他请假回家探望时被杀害了，还被破腹碎尸，头被砍下后送到县城去了。这个多次立下战功的好战士好参谋长牺牲时才35岁。死后也身首异处，想起那情景就叫人心痛啊！

红军队伍从地龙坪开走以后，团联匪首、罪恶累累的国民党反动“团总”胡元卿在地方上实行清剿，很多红军战士、无辜百姓被残害。家住地龙坪的红军排长袁秀棋1931年5月在鹤峰响水坪与胡元卿团防作战时被俘。团联匪徒将他押回采花二龙坪，敌人用猴儿抱桩酷刑活活将他整死。敌人将他的双脚反背到背后，又用两根一尺多长的竹桩从两只脚板心穿过并钉到地下，又让他的双手按到面前的两个大木桩上，

两只手心都用大钉子钉着。英勇的袁排长毫无惧色，忍受着这万箭穿心的折磨，硬是一天一夜不住地对着反动派叫骂，后来脚丫子被扯掉，全身血液流尽，壮烈牺牲。敌人还不放过，又将他的尸体弄到被他枪杀的团匪走卒马司元的坟里作祭。真是丧尽天良！

红军炊事兵高启明，被敌人抓去活活打死，牺牲时全身的皮肉变成了血丝。家住红渔坪的红军战士关义喜是民众代表，团联走卒刘守仁戴着红袖章哄骗他去参加紧急会议，走到地龙坪尸场坪时匪徒在他背后用马刀砍下他的头。传说头被砍掉了，他还毅然向前走了三步才倒下。反动派是何等凶狠！先烈们死得多么悲壮啊！

那时候，我们什么也不怕，真是提着脑袋干啦！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为民除害，让穷人都过上好日子。真的是脑壳掉了只碗大个疤，粉身碎骨浑不怕。我们为的什么？为的就是今天的天下，为的就是今天的幸福生活。我已经老了，我要告诉青年人吃了木耳莫忘树菟，要听党的话，走社会主义的路，这样才能让九泉之下的英灵们放心！

听完马老的话，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。我们更深地懂得只有忠诚地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勤奋工作，才能不辜负先辈们的厚望。

征兵“抽签”记

曾宪浓

抗战时期，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，使祖国半壁河山最终沦为日寇的铁蹄之下。由于辖区缩小，蒋深感兵源不足，于是改“募兵制”为“征兵制”，以大量扩充兵源，保存军队实力。

开始政策规定：年满18岁至25岁的三丁抽一、五丁抽二。赘婿无子不征，二子免征或缓征，独子不征，身体残废和精神病患者免征。开始时，还象么象样地执行了两年。

以后，既要同日寇虚以周旋应付，似打非打，假戏真唱。又要对共产党处心积虑地加以设防，针锋相对，认真较量。同时还要充实地方反动武装对付武装游击队，治安“勘乱”。四处张罗，形成捉襟见肘，穷于应付之势。这就不能按政策规定了。

一般的穷人，只要你是“低水”，三丁可以抽二，五丁甚至抽四，两丁抽一，独子也征。有十三、四岁的娃娃兵，四、五十岁的胡子兵。我表叔周绪元51岁，也剃了胡子，被征到“铁肩”运输队，后死于外地。反之，只要你是富人，有权有势有钱，就是四、五、六，甚至九兄弟，一个不去纹丝不动，也仍法外逍遥。某官姓九兄弟、吴姓四兄弟、张李大户也有三、五兄弟，只要有钱，就可通神，一个不去。

因此，世道不平，群情激愤，街谈巷议，怨声载道。在

此情况下，他们与官府上下互相串联勾通，共同作弊，导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有声有色、有板有眼的征兵“抽签”丑剧。

首先，由乡保甲出面，广为宣传。然后在向氏祠堂中殿或李氏祠堂上殿，摆设供桌、香案、祭品、签筒，内装用红纸写就的“免征”、“缓征”、“应征”三种张卷。免、缓只限于这一次，不是永久的。往往一年征某1—3次多到5次。

抽签时，应征对象成排地统统跪在香案前，家属均屏立于殿外。由一人即所谓“德高望重、公正无私”的人，文质彬彬地读词通诚，焚香礼拜。然后一字排列，依着次序一人抽一张卷，当场打开，文书记录。这时家属们便屏声静气，只在心里默默祈祷念佛许愿，为自己的亲人祝福好运。据说这样是再公平不过的，全凭祖宗功德保佑，听天由命，谁也怨不怨着谁。

记来不怪也怪，确是“天佑富人”。每次抽签着“应征”签的偏偏全是穷家子弟，富人子弟不是抽着“免征”，就是“缓征”，这也就不免引起了穷人中稍有头脑人的怀疑和猜测，甚至不平。为什么天道不公，独佑富人？后来，由于他们内部分脏不均，发生争吵，拆穿了“西洋镜”，内幕外泄，真相大白。人们才如梦初醒：啊！原来如此：

他们在炮制和抽签前，把三种纸卷分别做上不同的“暗记”。有钱子弟的家长首先拿钱与当事人交容疏通，弄清暗记的特征痕迹。其钱的多少并非明码实价，主要据富裕程度而定。而且“公允”，准许抽到“免征”和“缓征”签后再付款，先只预定价格。但事先预约一条，站队时必须尽力往前站，因免缓签不多。若上面需征20名，免缓签也不过20名。若往后站，给穷子弟们碰巧拿走了，即使退财也同样倒霉。

抽到“应征”签，在众目睽睽下，就爱莫能助了。

每次抽签时，恰巧富家子弟尽力往前挤，争先恐后，表现出“积极应征、保家卫国”的慷慨激昂之情。穷人子弟呢？心中无底，无荫可恃，尽量往后缩，如上杀场，延缓得一刻算一刻。这就自然划分了穷富两条线，一边有心，一边无意，所以穷人子弟最后抽的尽是应征签。并非天意如此，也不是神佑富人。

此事一揭穿，立即群情汹涌，势若燎原之火。街头巷尾，恨声骂声、哭声叫声，沸沸扬扬。甚至在宫、吴几家大户门前哭哭吵吵，闹得不可开交。乡保长一个个不敢露面，怕犯众怒。看来，不动点真格的是于理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的。不得已，他们协商，宫家九弟兄年龄大多已过，吴家四兄弟都当权执政声势显赫。故公推老二（国民党区长）的儿子出面应征，穷人子弟应征，皆为绳捆索绑，如串猪羊，非打即骂。而他尚未入伍，就先荣任了连长（实为排长衔）。走的那天，送征家属，轿抬马骑，衣冠楚楚，前呼后涌。他本人身穿全新的呢子制服，斜挂皮带，肩章领章，耀眼夺目，坐在滑杆上，威风凛凛。四周百姓，挨家逐户通知前往欢送。鞭炮乐鼓不绝于耳，在渔洋关地区实属罕见。

以上就是他们串演的一幕征兵“抽签”的闹剧。

覃守一投诚前后

张静轩口述 胡发源整理

解放前夕、覃守一任国防部政工五大队大队长，鄂西七县反共挺进总司令何大熙的第一纵队司令，兼长阳县县长。在解放军进逼资丘时，带伪县政府三百余人退驻付家堰。由于时局动荡，乡长田嗣禹避在家中（天池口），作为主任干事、募僚长（副乡长）的我，自然要承担起诸方面的联系及其生活安排，从而忙碌奔波于其间。

初冬的阳光从东方冉冉升起，渐渐驱散了高空的云，低空的雾，日脚伸向收割的田野和茂密的森林，好一个艳阳天，给人们带来温暖和欢快，然而兵荒马乱的时局又给人们的心里带来一些紧张。就是这一天，即1949年11月11日，刚吃早饭时，县政府秘书——张子型传令我到付家堰小学参加开会。开会做什么？的确是我心里的一个疑问，到会场一看，有县长覃守一，议长周临川，书记长易子良，区长覃少府等人在前面就坐；县科级职员，县大队军官以及付红乡部分公职人员共一百多人，在室内洗耳恭听；门卫严严把守，真有几紧张气氛。

会议开始了，县长覃守一站在讲台前，目光四下环视片刻，就从衣袋里掏出事先写好的布告，展开后大声说道：“布告，奉江汉军区令，潜伏鄂西工作，相机夺取政权，策应南渡西进。本指挥奉命宣布解放，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